

新闻关注



潘基文连任秘书长 引老子名言发表演说

联合国大会6月21日通过决议,任命潘基文连任联合国秘书长。潘基文援引老子“天之道,利而不害;圣人之道,为而不争”的名言,强调应将这种不朽的智慧应用到今天的工作中。



梅德韦杰夫否认与普京隔阂加深

近日,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表示,不会让大家等很久便会宣布是否决定参选俄罗斯总统,他否认了与总理普京之间分歧加深的传闻。



奥巴马担忧爱女拍拖 笑言审问其追求者

奥巴马在父亲节前夕谈及长女玛莉亚下月将踏入13岁,非常关心女儿的拍拖问题,笑说会把女儿的追求者抓进白宫“审问”。



洞房之夜 新娘临时落跑

美国成人杂志《花花公子》创办人休·赫夫纳与25岁的未婚妻丽丝特尔·哈里斯原定18日共结连理。然而,哈里斯临时“落跑”。

周末人物 日出东方·建党90周年纪念特刊 ⑤

1921年7月,上海李汉俊家一楼的客厅并不宽敞,一群年轻人围着一张长餐桌,带着冒险的心情,热切期待一个全新的政党的成立。

1921,相聚上海的那群年轻人

□ 本报记者 卞文超

中共一大代表 命运各有选择

□ 卞文超

进入6月份,中共一大纪念馆每天接待游客超过4000人。

这栋青灰色的石库门房,位于上海市黄陂南路,与五光十色的上海新天地比邻而居。90年前,这是一栋普通的民房。今天,这里供奉着1921年一群年轻人的理想与信仰。

1921年7月,上海天气闷热。李汉俊家一楼的客厅并不宽敞,一群年轻人围着一张长餐桌,带着冒险的心情,热切期待一个全新的政党的成立。当时他们脑海中或许还未曾想到,此情此景对中国历史的意义,将以“开天辟地”四个字来形容。

北李南陈 两大星辰

这群人有13名中国人,两名外国人。他们从哪里来?原本过着怎样的生活?什么促使他们在这里相聚?

回答这些问题,必须回到历史的大图景下寻找答案。中共“一大”纪念馆党史专家信洪林回顾了这段历史。

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,进步青年中流传一首小诗:“北李南陈,两大星辰,漫漫长征,吾辈仰承”。陈独秀和李大钊南北呼应,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。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。但当时共产主义思想被认为是激进的思想,不被主流所认可。

1920年夏,30岁的公费留学生李达从日本回到上海。1918年,段祺瑞军阀政府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卖国条约,留学生罢课回国,李达是回国请愿救国团的带头人之一。此次爱国运动以失败告终,他决心放弃理科,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,并陆续发表介绍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。

在上海,李达找到了陈独秀。陈独秀正在酝酿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,邀请李达参加,李达欣然同意,立即投入工作。

1920年8月,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。小组最早的成员包括陈独秀、李汉俊、杨明斋、李达、陈望道等。他们文化程度较高,对新鲜事物有敏锐的观察力,富有革命朝气。

就在这个月,陈独秀写给李大钊一封内容非常重要的信件,信中通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的情况。北大毕业生张国焘、张申府刚从上海回京,李大钊听取了二人的见闻,大家一致认为北京组党的条件已经成熟。

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,李大钊、张申府、张国焘三人正式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。张国焘是首任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、讲演部长、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。1920年11月,他和邓中夏等人发起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,振臂一呼,意气风发。

此后很短的时间内,陈独秀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又陆续发信给武汉、长沙、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者,鼓励他们成立同样性质的组织。

至1921年夏,全国共发展了53名共产党员,在七八个中心城市有了组织和活动。

他们平均年龄不到28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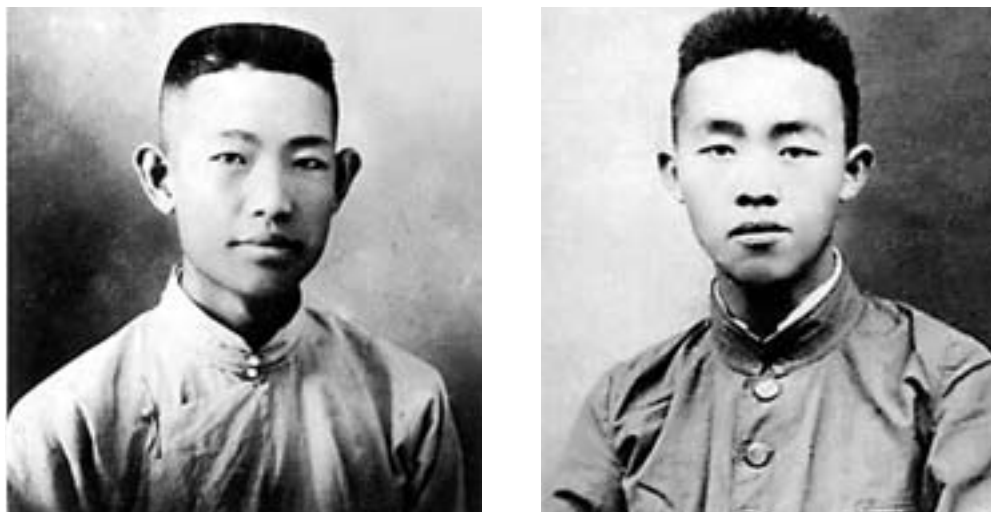
1921年6月3日,荷兰人马林自莫斯科经欧洲抵达上海。此时,以列宁为首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极为关切。马林是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。与此同时,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尼柯尔斯基抵达上海。他们和李达、李汉俊建立了工作联系,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,宣告党的正式成立。

刚过而立之年的李达、李汉俊作为上海代表,分别写信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,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大会。

历史偶然性的一面在这里显现。李大钊没能出现在中共一大的会场上,他被校内繁忙的公务缠身。当时,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的同时,还担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8校的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代理主席。6月3日,他率领各校教职员和学生千余人到国务院请愿,要求拨发教育经费,遭到反动军警殴打,昏迷倒地,直到6月16日才伤愈。正在此时,李达来信要求推派代表到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。于是决定推派张国焘、刘仁静作为代表出席党的“一大”。张国焘要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,所以最先到达上海。19岁的刘仁静随后于7月上旬抵达。

陈独秀也缺席了中共“一大”。原居上海的陈独秀受陈炯明邀请,赴广州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,同时兼任广东大学预科校长。当时,他正忙于争取一笔款项修建校舍,如果他一走,房子就不好办了,因此不能离开广州。陈独秀临时指派包惠僧代替他参加。

“北李南陈”缺席,中共一大会议上30岁以下的代表占了绝大多数。他们都是知识分子,接



上图为中共一大纪念馆蜡像展示当时开会场景。一大济南代表王尽美(下左)和邓恩铭(下右)。以上图片均为资料片。

受的是新式教育,平均年龄27.7岁。

年龄最长者是45岁的何叔衡,他和毛泽东共同作为长沙代表赴沪。他们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动身赴沪。何叔衡当时在湖南通俗教育馆编《通俗报》,与其共事的谢觉哉在6月29日的日记中记载:“午后六时,叔衡往上海,偕行者润之,赴全国00000之招。”(00000作“共产主义者”)。出发时在夜晚,黑云蔽天作欲雨状,谢觉哉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,两人拒绝友人送上轮船。7月4日,两人前后到达上海。

来自济南的代表是23岁的王尽美和20岁的邓恩铭,两人都是学校在读生。在中共“一大”上,他们是除了刘仁静之外,最为年轻的两位。两人于6月底以前到达了上海。

来自武汉的代表董必武、陈潭秋以及旅日代表周佛海,在7月下旬会议即将开始时也赶到了上海。

“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”

13名代表陆续抵达上海,以“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聚集。其中9人住进了太仓路127号(原白尔路389号)博文女校的校舍。

住宿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具体安排。博文女校董事长是黄兴的夫人徐宗汉,校长是黄绍兰。王会悟时任《妇女声》编辑,与二人关系很好,她以“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”的名义,租借了校方教室。毛泽东、何叔衡、董必武、陈潭秋、王尽美、邓恩铭、刘仁静、包惠僧、周佛海先后住进博文女校。正值学校放暑假,校内相当安静。只有一名兼看校门的厨师,每天给代表们做饭,不许闲人进入校内。

28岁的毛泽东此前一年就曾寓居上海。1920年5月至7月,他经常拜访陈独秀。在陈独秀的寓所内,毛泽东同陈独秀一起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以及组织湖南联盟的计划,陈独秀也向毛泽东讲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。后来,毛泽东在跟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交谈时回忆道:“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,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,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。”“到了1920年夏天,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,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。”

当毛泽东1921年再度抵达上海,他对中共一

大会议相当重视。开会休息时,他经常在住宿的厢房内,低着头来回踱步,苦苦思索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。

据陈潭秋等人回忆,中共一大会议的开幕式(也有人称之为预备会议)就在博文女校楼上举行。“一大”正式会议,在李汉俊家中秘密召开。

没人知道党代会该怎么开

李汉俊公开的身份是新时代丛书社编辑人、联络人、房主人。他和哥哥李书城一起住在望志路106号、108号。这是沿马路一排五幢石库门房屋中并排的两幢,与后排四幢房屋通过过街楼相连一起,成为一条弄堂,人称树德里(今黄陂南路374弄)。

在今天的一大会馆,能看到复原的会场。一楼客厅的长餐桌上,摆放着茶壶、茶杯、火柴架。加上两名共产国际代表,这间不到10平米的客厅要坐下15个人,空间十分局促。来自各地的知识分子,抱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,彼此之间没有距离。

这次大会原计划由陈独秀主持,因为他未能出席,临开会前另推张国焘主持,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。

党的代表大会应该怎么开,应该有什么议程,具体决定什么?没有人知道。共产国际的两名代表对此提供了一些建议。大会确定了要讨论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是,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,会上还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。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。虽然会议的规模不大,但是这次会议在共产国际的组织体系之中召开,备案至共产国际,是一次正式而严谨的会议。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是协助者,议题和议程由中国共产党代表自己决定。

7月24日,中共一大举行第二次会议,各地代表报告工作情况,交流工作经验。25日、26日休会两天,起草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等会议文件。27日至29日,大会举行第三、第四、第五次会议,讨论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。这几次会议,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。

法国巡捕突然搜查

7月30日,上海气温高达37摄氏度。酷暑夏夜,举行第六次会议。大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,然后讨论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。

会议刚开始不久,一个“穿灰色竹布长衫”的不速之客从弄堂进来直接推开门,闯入了会场。张国焘在晚年有比较详细的回忆:大约七月八日晚七时……正要宣告开会的时候,突然有一个陌生人揭开书房的门帘,窥探了一下,说声“我找错了人家”,就转身走了。我们都警觉到这可能是法租界的暗探。我立即请大家将文件收拾好,准备立即离开,并将此事翻译给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听。马林十分机警,从座位上一跃而起,以手击桌说:“我建议立即停止,所有的人分途离开。”

于是,代表们迅速从前后门分别离开,只剩下李汉俊、陈公博两人。陈公博最早回忆了此事,他的《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》在事件发生后十来天内写出,采用一些隐语公开发表在《新青年》杂志上:

此次我在上海,最使我觉得滑稽的,就是被法国巡捕误认我是日本社会党……有一天夜里,我和两个外国教授(意指马林和尼柯尔斯基)去访一个朋友(意指李汉俊),谈了片刻,两个外国教授因事先行,我因为天热的缘故,不愿匆忙便走,还和我的朋友谈谈广州的情形,和上海的近况;不想马上便来一个法国总巡,两个法国侦探,两个中国侦探……搜查之后,微笑着对着我们说:“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;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,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,鼓吹社会主义,就未免发生危险。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,捕你们,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,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……”

从这段记述中看,法国巡捕还算客气。另据李汉俊回忆,当晚法租界巡捕房共派了9个人包围了他的家。他们翻箱倒柜足足搜查了1个多小时,除了查到一些社会主义相关书籍外,并没有其他可疑。

其实,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,因为涂改得很乱,字迹模糊,他们以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,连看也不看,证据一无所获。总巡和侦探离开李汉俊的家,在房屋周围布下密探。陈公博离开时被密探跟踪。当晚,他住宿的大东旅馆又发生了一凶杀案,陈公博在睡梦中被枪声惊醒,吓出一身冷汗。次日,29岁的陈公博带着年轻的太太,乘火车至杭州灵隐寺去安神养心,以度蜜月为由躲开了会议。

嘉兴南湖再议

今天,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史专家信洪林认为,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来到上海的消息,外国警方已经通知到法租界和中国政府当局。他们未必清楚这个组织要干什么,为了防范这个会议的召开,专门颁发了一个禁止集会的法律条例,刊登在7月30日在法租界报纸上。这个条例并非永久性禁止集会,而是临时性地禁止。这是当时的法律环境。

中共一大中途受到干扰被迫休会,代表们商议到浙江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。现存回忆录记述,那天天阴,有时还下小雨。湖面上有四五条游船,代表们叫船主把船撑到比较僻静的水域,用篙插住。李达夫人王会悟在船头望风。开会时还特意将带来的麻将牌倒在桌上,以掩人耳目。

上午11时许,下起滂沱大雨,游人渐渐散去,湖面上人烟稀少。此时,“一大”南湖会议开始召开,用一天时间结束会议。

此次会议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,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。正在确定最后一项议程时,湖面上突然传来一阵“突突突”的响声。难道是警察的汽艇?大家慌忙收起刚刚讨论通过的文件。汽艇由远而近,汽艇从游船旁一掠而过,原来是嘉兴城内一位绅士的私人游艇。一场虚惊!下午6时左右,南湖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,大会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闭幕仪式,代表们在闭幕时轻声呼喊:“共产党万岁!第三国际万岁!共产主义、人类的解放者万岁!”

至此,中共一大完成了历史使命,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。

“当时他们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,有冒险成分在里面。任何人在冒险时候,不会憧憬以后被纪念。他们是在探求,探索,怎么样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局面,如何获得强大。”信洪林说,中共一大上相聚的这些年轻人,归根结底,心中把国家民族的前途放在第一位的。这一点和鸦片战争后历代仁人志士的追求并无二致。这也是那个年代的时代精英共同的追求。

临近7月,中共一大纪念馆游人如织。纪念馆办公室主任于永成告诉记者,自去年以来,纪念馆60%以上的观众并非集体组织参观,而是自由散客。在二楼,一组逼真的蜡像成为纪念馆重要景点。由于中共一大举行年代较早,没有留存下完整的实物和图片资料。这组蜡像为人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。

十五人围桌而坐,居中者毛泽东,是全场唯一站立发言的代表。讲解员介绍,毛泽东当时担任会议记录,在会上确实作过一次发言。他报告了长沙党组织的建立情况,主要工作,活动方式和经验教训。

关于毛泽东在一大会上的情况,很多代表后来都有回忆。刘仁静回忆:“毛主席很少发言,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。”包惠僧回忆:“我对毛泽东当时的印象是老成持重,沉默寡言,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。”

在战乱伴随价值观激烈交锋的年代,中共一大会议聚起的这帮年轻人,选择了不尽相同的道路,走向了不同的命运。在讲解员口中,“成王败寇”的思路似乎更容易被大众接受。其中几位脱党人士被冠以“叛徒”之名,以背对观众的形式出现在蜡像群中。

党史专家信洪林并不完全赞成“叛徒”的说法。他认为,除了极个别,大部分脱党人士退出党组织,是由于党内政见不合、文人意气用事,并不足以据此评判其道德高下。中共一大代表们生平简介如下:

张国焘(1897—1979),北京代表,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,负责组织工作。1935年,红军长征时,进行分裂党和红军活动。1938年被开除出党。1979年在加拿大病逝。

李达(1890—1966),上海代表,在一大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,负责宣传工作。1923年和陈独秀、张国焘发生矛盾和冲突而脱党。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,后任武汉大学校长。1966年于武汉病逝。

李汉俊(1890—1927),上海代表,1924年脱党,后任上海大学教授,湖北教育厅长。1927年在武汉遭军阀杀害。

董必武(1886—1975),武汉代表,后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、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。1975年在北京病逝。

刘仁静(1902—1987),北京代表,1929年赴苏学习,因参加托洛斯基派别组织被党开除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,国务院参事。1987年在北京去世。

陈潭秋(1896—1943),武汉代表,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、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。1942年9月在新疆被捕,次年在新疆监狱中被害。

陈公博(1890—1946),广州代表,1922年秋脱党。1938年投敌,追随汪精卫政府。抗战胜利后,以叛国罪被判死刑,1946年在苏州被枪决。

周佛海(1897—1948),旅日代表,1924年脱党。1938年投敌,追随汪精卫政府。抗战胜利后,以叛国罪被判无期徒刑,1948年在南京狱中病死。

何叔衡(1876—1935),长沙代表,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查部部长,1935年2月,在福建上杭牺牲。

包惠僧(1894—1979),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一大会议,1927年脱党,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。1979年在北京病逝。

王尽美(1898—1925),济南代表,原名王瑞俊,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,有志于“尽善尽美唯解放”。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。1925年8月,在青岛病逝。

邓恩铭(1901—1931),济南代表,后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。1928年在济南被捕,1931年4月在济南被害。